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所想

陳來元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十二月十三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國第一次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了國家公祭儀式。

南京大屠殺是二戰歷史上「三大慘案」之一，是一宗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此早有定性和定論，一批手上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受到了法律和正義的審判與嚴懲，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對日軍在南京慘無人道地屠殺我國三十萬放下武器的軍人和手無寸鐵的平民的血腥罪行始終不肯承認，並惡意篡改歷史，為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竭力塗脂抹粉，美化侵略戰爭。特別是近幾年來，日本右翼在事關拜鬼、奪島、擴軍、修憲等問題上變本加厲地不斷對我國進行挑釁。在此背景下，我國對南京大屠殺慘案立法設立國家公祭日，並在國家層面高規格舉行公祭，緬懷慘遭日本侵略者殘害的死難同胞和為抗日而獻身的革命先烈，提醒人們牢記中華民族這段慘痛的歷史，時刻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同時宣示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崇高願望，有着十分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國家公祭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的意志，必能進一步凝聚全民族奮向上的力量，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公祭是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的，這使我聯想到了我曾在耶路撒冷參觀過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世界有猶太人約一千二百萬，遭納粹屠殺的就有約六百萬。一九四五年，猶太人在英國倫敦舉行了二戰後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決定由巴勒斯坦猶太民族委員會領導建立這一紀念館。這座紀念館是根據以色列國會通過的紀念法令，為永久紀念在二次大戰期間被屠殺的猶太人而建立的，於一九五三年初建成，一九九三年重建。

這座紀念館包括一座歷史博物館、一座檔案館、一座猶太教堂、一座死難兒童紀念館、一條畫廊、一間「姓名大廳」、一個教育中心以及與大屠殺有關的展廳等部分。該紀念館的任務和職能是：收集、保存大屠殺受害者的名字、關於大屠殺的照片、文件和倖存者的證詞；研究大屠殺歷史，出版英文和希伯來文的與大屠殺有關的書籍和期刊，向全世界提供有關大屠殺時期的信息和資料；經營「大屠殺學國際學校」；舉辦大屠殺展覽，進行關於大屠殺的公眾教育；舉辦紀念儀式，紀念大屠殺受害者；幫助國外司法機構審判戰犯等。大屠殺紀念館內內容豐富，資料翔實，是以色列對猶太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課堂。

但這座紀念館同時也是以色列向國際社會揭露二戰期間納粹罪行和展示在歷史上猶太民族苦難的生動課堂。為此，凡是訪問以色列的外國高級代表團，以色列方面都要首先安排其參觀這座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然後再舉行會談會見和其他活動。以色列方面的這一做法，收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可以說，參觀者人人都對希特勒法西斯的滔天罪行十分憤慨，同時對猶太人的歷史苦難深表同情。據報道，喬治·布什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曾到訪以色列，在參觀大屠殺紀念館時流下了眼淚，並表示當時的美國政府應設法解救奧斯威辛集中營裡的猶太人，來阻止這場大屠殺。

對納粹的暴行，二戰後德國政府誠懇地懺悔，前總理勃蘭特在一九七〇年甚至向死難猶太人下跪謝罪。儘管如此，以色列仍堅持將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作為一座教育、宣傳基地，用來揭露納粹的罪行和展示猶太人的民族苦難。而時至今日，日本右翼不但始終不能正確地對待歷史問題，並一味美化侵略戰爭性質，而且還不斷地向中國挑釁。有鑒於此，為使中日兩國人民更好地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並使各國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共同為人類和平作出貢獻，我們是否可以也多少學一學以色列的做法呢？

隱身雲霧

顧農



遊過大山的人都知道，繚繞在山腰和遠處的那些雲，其實就是霧氣——近處感覺是霧，遠看就是雲。易地而處，情況也是一樣。古代的隱者喜歡躲入深山，避開世俗的紛擾，過一種半仙似的生活；當然仍然會有朋友來訪，並非完全遺世獨立，但要找到這樣的隱者卻不容易，事先完全無從聯繫，好不容易爬山爬到他的住處，很可能不在，不知道他雲遊何處；即使知道在哪裡，也很難找到或等到他。唐人賈島（七七九～八四三）有一首《尋隱者不遇》詩專寫這樣的情境，歷來傳誦：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恬不知恥因哪般

外醫療技術剽竊來作為自己的「創造」，吹噓自己的理論和手術「可能五六年後獲得諾貝爾獎」。當被打假後，非但不收斂，反而花錢僱人報復打假人；因此被判處拘役，並被取消「首席科學家」頭銜和執業醫師資格後，還生氣哄哄地聲稱，打假人「說的所有話都是污蔑」，「僱兇打人」也是「造謠」。在我熟悉的一家煤炭企業，幾個所謂的筆桿子長期習慣編亂造新聞，寫「假大空」文章，被一位老新聞工作者揭露並直言批評時，非但不知羞恥，反而氣壯如牛罵道：「寫假新聞又不是我一個，裝啥子瘋？」「不寫假新聞就上不到稿，曉不曉得？閒事管得寬！」這不能不引人思忖：無德無良無恥，底氣何來？一言以蔽之：恬不知恥，只因心中沒有是非，毫無道德底線，缺少了做人最基本的恥感。我們的老祖宗說過，「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幾亂亡亦無所不至。」（北宋歐陽修語）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不廉潔就沒有什麼不想索取的，沒有羞恥之心就沒有什麼不幹的。要是到了這種地步，災禍、失敗、混亂、滅亡就沒有什麼不會降臨到他的身上。這話，值得記取。末了，還想補一句，僅僅把一些人的無德無良無恥歸結為個人原因，恐怕難以服人。應該深問：一些人無德無良，卻能氣壯如牛，毫無羞恥之心，是不是與所處的制度環境無度寬容和輿論環境聽任德墮也有關係？

譬如，要會寫先要會讀，熟悉並內化書面語言的節奏是寫出好文的前提。但寫作本身又充滿了矛盾和無聊。和當代人对萬事有頭有尾、井井有條的期望相悖，寫作永不會終結。寫作的重頭是思考，但我們腦中所想和紙上所現往往截然不同。有時，我們通過寫作發現了自己一直不願直面的現實。有時，寫作又顯得百無一用。寫作要全面徹底，但不可枝節過多；要聚焦明確，但又要例證充分；要語言生動，但不可絮絮叨叨；要結構嚴密，但有時最讓人難忘的作品卻是靈機一動的偶得。最後，X教授從地下室發出的聲音提醒了我：高校可能是讓人忘卻現實的象牙塔、「肥皂泡」，寫作則永遠是艱辛、孤獨、漫長的歷程。

蕭紅：屬於香港



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的蕭紅，其生命如劃過天際的流星，僅只短短三十一年。追蹤其生命軌跡：二十四年在哈爾濱，三年半在上海（包括在青島、去日本一年多），兩年在漢口、臨汾、西安與重慶，兩年在香港。但就其與各地區的關係、在居住地的文學活動而言，她無疑屬於香港。這裡是她夢寐以求的寫作佳境。一九三九年底，重慶遭日機頻繁轟炸。蕭紅體弱多病，經不住每天跑警報鑽防空洞。被王明撤掉了《新華日報》總編職務的華崗建議：「你們還是到香港避一避吧！」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七日，蕭紅與丈夫端木蕻良，乘機飛抵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溫煦的南國海風令人心曠神怡；難懂的粵語，夾雜其中的大不列顛語言，提醒他們：到了英屬殖民地。在孫寒冰的安排下，他們住進九龍尖沙咀金巴厘道諾士佛台街三號（後搬至樂道八號二樓大時代書局）。甫一住下，戴望舒便駕車來接他們去他和穆麗娟的住處林泉居參觀。戴望舒與蕭紅夫婦結交一年，一見如故。

次日，葉靈鳳主持的《立報》副刊《言林》在「文化情報」上發了消息：「端木蕻良蕭紅昨日由內地來港暫住九龍。」接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在大東酒店舉行會員聚餐會，歡迎蕭紅端木來港。翌日《立報》報道：「……到會員四十餘人，由林煥平主持……九時散會。」

蕭紅十分滿意於香港的一切，給在渝的好友白朗寫信說：「這裡的一切景物都是那麼恬靜和幽美，有山，有樹，有漫山遍野的鮮花和婉轉的鳥語，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對着碧澄的海水，常會使人神醉的，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夢想的寫作佳境嗎？」

香港兩年是她文學創作巔峰期幽美的寫作環境，激發起了蕭紅噴薄的寫作熱情。她到港後的第一部作品《後花園》，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在《大公報》副刊「文藝」上連載。一九四〇年，是蕭紅的「筆桿年」、「生命年」；香港兩年，是其創作的巔峰期，茅盾欣喜地說「紅姑娘創作甚為努力」。她一生三部長篇中的兩部——《呼蘭河傳》與《馬伯樂》——就是在香港完成的。可以說香港參與了蕭紅文學作品的最後創作。

蕭紅與香港文藝界，其實是深有淵源的。一九三九年二月，戴望舒致信蕭紅、端木蕻良，邀請他們為他主持的《星島日報》「星座」副刊撰稿。蕭紅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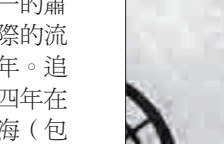
能夠遇到這位隱者的徒弟已是來訪者的大幸，從他口中得到了確切的回答——可惜那信息本身卻是模糊的。從童子的回答來看，他們有三問三答。一問你師傅在家嗎？答：出去採藥了。二問在哪裡採藥？答：就在此山採藥。三問在山的哪一處採藥？答：不知道，總之在白雲深處。此詩措辭極妙，把完全是事務性的問答改造為大有味道的一首小詩，這是很大的本領。詩中寫景只用了兩個字：松、雲，而大有意味，「無復人間煙火氣」（黃叔燦《唐詩箋註》卷七）。隱者生活簡單，意趣高雅，正與松、雲的特色相合。有其師必有其弟，這童子回答客人的問題也很得要領，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簡明含蓄，所以來訪者雖不免失望惆悵，但仍然留下美好而難忘的印象。雲霧深處便於遠離世俗，防止污染和干擾

象牙塔的地下室

域外漫筆

他也不相信「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認為專業知識過硬就能當個好教師。他還覺得學子是個放棄自尊、順從權威的歷程，並不贊同師生平等的論調。但他有些觀點卻有振聾發聵的文化批判效果。如他說二十一世紀美國人儘管鼓吹「多元化」，卻不願承認個人天資和學習能力有差異。學生如果無法順利畢業，大眾不會歸咎於他們本人能力不夠，而是指責教授的教學方法。其實，只有學生本人擁有極大動力、精力和能力才可能在大學成功。X教授因為在二〇〇七年經濟蕭條前剛買了新屋不得不兼職：白天為政府部門工作，晚上下了班再去兩所大學教夜校，一門課每學期約收入二千美元。書中描述他的打工生涯時不免被個人經濟負擔重、家庭關係緊張的餘韻涉及。但作為一個資深作者，他對寫作的愉悅和艱辛也別有會心。

蕭紅：屬於香港



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的蕭紅，其生命如劃過天際的流星，僅只短短三十一年。追蹤其生命軌跡：二十四年在哈爾濱，三年半在上海（包括在青島、去日本一年多），兩年在漢口、臨汾、西安與重慶，兩年在香港。但就其與各地區的關係、在居住地的文學活動而言，她無疑屬於香港。這裡是她夢寐以求的寫作佳境。一九三九年底，重慶遭日機頻繁轟炸。蕭紅體弱多病，經不住每天跑警報鑽防空洞。被王明撤掉了《新華日報》總編職務的華崗建議：「你們還是到香港避一避吧！」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七日，蕭紅與丈夫端木蕻良，乘機飛抵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溫煦的南國海風令人心曠神怡；難懂的粵語，夾雜其中的大不列顛語言，提醒他們：到了英屬殖民地。在孫寒冰的安排下，他們住進九龍尖沙咀金巴厘道諾士佛台街三號（後搬至樂道八號二樓大時代書局）。甫一住下，戴望舒便駕車來接他們去他和穆麗娟的住處林泉居參觀。戴望舒與蕭紅夫婦結交一年，一見如故。

次日，葉靈鳳主持的《立報》副刊《言林》在「文化情報」上發了消息：「端木蕻良蕭紅昨日由內地來港暫住九龍。」接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在大東酒店舉行會員聚餐會，歡迎蕭紅端木來港。翌日《立報》報道：「……到會員四十餘人，由林煥平主持……九時散會。」

蕭紅十分滿意於香港的一切，給在渝的好友白朗寫信說：「這裡的一切景物都是那麼恬靜和幽美，有山，有樹，有漫山遍野的鮮花和婉轉的鳥語，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對着碧澄的海水，常會使人神醉的，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夢想的寫作佳境嗎？」

香港兩年是她文學創作巔峰期幽美的寫作環境，激發起了蕭紅噴薄的寫作熱情。她到港後的第一部作品《後花園》，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在《大公報》副刊「文藝」上連載。一九四〇年，是蕭紅的「筆桿年」、「生命年」；香港兩年，是其創作的巔峰期，茅盾欣喜地說「紅姑娘創作甚為努力」。她一生三部長篇中的兩部——《呼蘭河傳》與《馬伯樂》——就是在香港完成的。可以說香港參與了蕭紅文學作品的最後創作。

蕭紅與香港文藝界，其實是深有淵源的。一九三九年二月，戴望舒致信蕭紅、端木蕻良，邀請他們為他主持的《星島日報》「星座」副刊撰稿。蕭紅發表

物質生活條件肯定會差一點，那也認了，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現代人如果要想隱居，那就簡單得多了：不妨仍然住在原先的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裡，這裡經常有霧霾環繞，正所謂「雲深不知處」；來電話不接，別人也就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來訪者一般不會冒冒失失登門，而且即使他到了自家門口，如果不想見，則其人也將不得其門而入，甚至連小區的門也進不了。這樣做當然很得罪人。既然要當隱士，還怕什麼得罪人！大隱隱於朝市。看來基本不用或根本沒有手機，乃是當今避開世俗紛擾的主要出路。可惜污染避開不了，除非走出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跑進深山老林裡去，靠採藥謀生。

恬不知恥因哪般

週末，捧讀一位朋友推薦的內地雜誌，讀到一位作家在隨筆中講述的親歷故事：一天，坐火車回天津。車廂封閉，有空調，誰都知道這場合是不該吸煙的。然而，坐在前面幾排的兩位年輕人，卻旁若無人地抽着煙。一位老外見了，忍不住走過去，用熟練的漢語提醒道：「先生，這裡不要吸煙！」老外以為，嚴肅的提醒，定會令兩人不好意思，隨之出現「對不起，對不起」的連聲道歉，並接着掐滅煙頭的一幕。不料，他想了，那兩位小伙子不待他話音全落，騰地站了起來，四目圓睜，狠狠地盯住了他。老外一看不妙，自嘲地聳了聳肩，攤了攤手，紳士碰到無賴般地轉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那個老外以為，他不再管了罷了。沒曾想，又錯了，他剛剛回到座位上，那位則坐在他对面的空座上。接着，兩人分別地狠狠地吸了一口煙，衝着老外的臉，近距離地徐徐地噴了過去。老外人卻不懂得「好漢不吃眼前虧」的道理，忍了。可兩個年輕人卻不放過，繼續一口接一口地將煙子噴去。面對不堪的侮辱，那老外竟一忍到最後，連肩都沒聳一下，只是默默地站了起來，一臉無奈一聲不吭地走了。讀這故事，心裡難以平靜：醜陋之下，還如此囂張，這叫不叫無德無恥、恬不知恥？這顆無德無良無恥的人和事，在我們身邊不時出現。國家能源局那位前局長劉鐵男，還有華潤集團前董事長宋林，就是典型。當他們會污腐敗，包養情婦的醜聞行徑被報時，非但不低調自省的態度，反而手下「家丁」公開回應，氣壯如牛地斥責學報人「是「造謠污蔑」、「惡意誹謗」，並聲稱要對「一切詆毀、誹謗」的言行「追究其法律責任並追償經濟損失」。

華中科技大學某教授也是這樣的醜態：利用國內外信息不對稱，將國外醫療技術剽竊來作為自己的「創造」，吹噓自己的理論和手術「可能五六年後獲得諾貝爾獎」。當被打假後，非但不收斂，反而花錢僱人報復打假人；因此被判處拘役，並被取消「首席科學家」頭銜和執業醫師資格後，還生氣哄哄地聲稱，打假人「說的所有話都是污蔑」，「僱兇打人」也是「造謠」。在我熟悉的一家煤炭企業，幾個所謂的筆桿子長期習慣編亂造新聞，寫「假大空」文章，被一位老新聞工作者揭露並直言批評時，非但不知羞恥，反而氣壯如牛罵道：「寫假新聞又不是我一個，裝啥子瘋？」「不寫假新聞就上不到稿，曉不曉得？閒事管得寬！」這不能不引人思忖：無德無良無恥，底氣何來？一言以蔽之：恬不知恥，只因心中沒有是非，毫無道德底線，缺少了做人最基本的恥感。我們的老祖宗說過，「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幾亂亡亦無所不至。」（北宋歐陽修語）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不廉潔就沒有什麼不想索取的，沒有羞恥之心就沒有什麼不幹的。要是到了這種地步，災禍、失敗、混亂、滅亡就沒有什麼不會降臨到他的身上。這話，值得記取。末了，還想補一句，僅僅把一些人的無德無良無恥歸結為個人原因，恐怕難以服人。應該深問：一些人無德無良，卻能氣壯如牛，毫無羞恥之心，是不是與所處的制度環境無度寬容和輿論環境聽任德墮也有關係？

純上

「X教授」當然是筆名。二〇〇八年他曾在美國著名期刊《大西洋月報》（The 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同名長篇散文，引發極大爭議。書中摘錄了作者收到的各色批評：歧視工人階級，教學水平低，懶惰，勢利，甚至是一「白領罪犯」的罵名。從書中描繪來看，他的確是個思維較為老派的老師，引導學生分析美國文學時，他不願意識及有關種族歧視的黑暗歷史。從權威的歷程，並不贊同師生平等的論調。但他有些觀點卻有振聾發聵的文化批判效果。如他說二十一世紀美國人儘管鼓吹「多元化」，卻不願承認個人天資和學習能力有差異。學生如果無法順利畢業，大眾不會歸咎於他們本人能力不夠，而是指責教授的教學方法。其實，只有學生本人擁有極大動力、精力和能力才可能在大學成功。X教授因為在二〇〇七年經濟蕭條前剛買了新屋不得不兼職：白天為政府部門工作，晚上下了班再去兩所大學教夜校，一門課每學期約收入二千美元。書中描述他的打工生涯時不免被個人經濟負擔重、家庭關係緊張的餘韻涉及。但作為一個資深作者，他對寫作的愉悅和艱辛也別有會心。

蕭紅：屬於香港

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的蕭紅，其生命如劃過天際的流星，僅只短短三十一年。追蹤其生命軌跡：二十四年在哈爾濱，三年半在上海（包括在青島、去日本一年多），兩年在漢口、臨汾、西安與重慶，兩年在香港。但就其與各地區的關係、在居住地的文學活動而言，她無疑屬於香港。這裡是她夢寐以求的寫作佳境。一九三九年底，重慶遭日機頻繁轟炸。蕭紅體弱多病，經不住每天跑警報鑽防空洞。被王明撤掉了《新華日報》總編職務的華崗建議：「你們還是到香港避一避吧！」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七日，蕭紅與丈夫端木蕻良，乘機飛抵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溫煦的南國海風令人心曠神怡；難懂的粵語，夾雜其中的大不列顛語言，提醒他們：到了英屬殖民地。在孫寒冰的安排下，他們住進九龍尖沙咀金巴厘道諾士佛台街三號（後搬至樂道八號二樓大時代書局）。甫一住下，戴望舒便駕車來接他們去他和穆麗娟的住處林泉居參觀。戴望舒與蕭紅夫婦結交一年，一見如故。

次日，葉靈鳳主持的《立報》副刊《言林》在「文化情報」上發了消息：「端木蕻良蕭紅昨日由內地來港暫住九龍。」接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在大東酒店舉行會員聚餐會，歡迎蕭紅端木來港。翌日《立報》報道：「……到會員四十餘人，由林煥平主持……九時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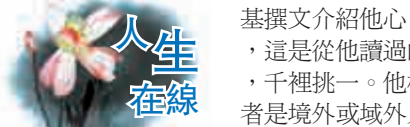
蕭紅十分滿意於香港的一切，給在渝的好友白朗寫信說：「這裡的一切景物都是那麼恬靜和幽美，有山，有樹，有漫山遍野的鮮花和婉轉的鳥語，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對着碧澄的海水，常會使人神醉的，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夢想的寫作佳境嗎？」

香港兩年是她文學創作巔峰期幽美的寫作環境，激發起了蕭紅噴薄的寫作熱情。她到港後的第一部作品《後花園》，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在《大公報》副刊「文藝」上連載。一九四〇年，是蕭紅的「筆桿年」、「生命年」；香港兩年，是其創作的巔峰期，茅盾欣喜地說「紅姑娘創作甚為努力」。她一生三部長篇中的兩部——《呼蘭河傳》與《馬伯樂》——就是在香港完成的。可以說香港參與了蕭紅文學作品的最後創作。

蕭紅與香港文藝界，其實是深有淵源的。一九三九年二月，戴望舒致信蕭紅、端木蕻良，邀請他們為他主持的《星島日報》「星座」副刊撰稿。蕭紅發表

蕭紅：屬於香港

世界眼光



近日，浙江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盧敏基撰文介紹他心目中的好書，一共六本，這是從他讀過的六千本書中遴選出的，千裡挑一。他梳理一下，其中五位作者是境外或域外人士。「小小吃驚之後，也明白現代社會必須抱有放眼全球之視野。想我這般既無通讀洋文原著之學養，又無生活異域之間體驗，譯著讀得多，仍然屁事不頂。」他還向同學感言：「我若只不過完成了『城鎮化』，『國際化』的使命只有待兒輩去完成。」當年清華學院裡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幾位先生，不僅國學水平是超一流的，即使以其西學水準而論，在當時的中國也是遙遙領先的。且不說那後三位曾經長期留洋的學者，即使是從未到過西方的王國維，也是第一個硬用西文去啃西學的中國人，而梁啟超雖然只是通曉日文，但是他勤於遊歷、廣交外國友人，又在不斷複述信息的辦報過程中，逐漸獲得了對於西方社會的廣泛通識。他正是在遊歷了歐洲之後，並且參照着現代西方社會的某些病痛，才返回到了文化相對主義的平等立場，意識到再一味地去鄙夷本土的文化，既是在學理上站不住腳的，也是在實踐上相當有害的。這種更為寬廣的態度，跟那些缺乏世界眼光的、視野狹隘的人相比，恰恰形成了明顯的反差。

談及有世界眼光的人文學者，不得不提馮友蘭（一八九五至一九九〇）。他於一九一八年在北平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畢業。一九二三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多所大學任教，還擔任過繁忙的行政工作。他矢志不移地會通中西方文化，在三十年代先後出版了《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冊。晚年又將中國哲學史重寫一遍。《中國哲學史》不僅是有史以來第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通史，也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中國哲學史。儘管學界對馮友蘭的評價呈兩極化，但對《中國哲學史》的評價存在驚人的一致：在目前所有中國哲學史著作中，還未能有任何著作能在整體上勝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

一九七七年馮著《中國哲學史》韓譯本由韓國瑩雪出版社出版，翻譯者為鄭仁在。朴槿惠是此書的一位用心讀者。朴槿惠在一篇回憶錄中說：「二十多歲時，我曾面臨難以承受的考驗和痛苦。父母都被槍殺，曾經信任的人離開，連呼吸都覺得困難。當時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她還曾這樣表達：「在我最困難的時期，使我重新找回內心平靜的生命燈塔的是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蘊含着正直、堅強的人類道義和戰勝這個混亂世界的智慧和教誨。」

我在美國大學教書超過十年了，看了「X教授」所著的《象牙塔中的地下室》（In the Basement of the Ivory Tower），才猛然發覺自己對美國高等教育的了解還太膚淺。譬如，我知道美國大學終身教職的位子越來越少，但之前還未意識到自己已在不覺成了「瀕危物種」。書中指出，二〇〇七年擁有終身教職崗位者（包括那些尚未升到終身俸的，只佔全美大學教師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三，在類似成人大學或夜校的美國社區大學（community colleges）中這個數字更低到可憐的百分之十七點五。再如，批改學生寫的英文學術論文時，我有時也感慨美國高中教育的缺憾，因為有些學生連基本語法都沒掌握，更別說言寫作的經驗卻讓我領悟到我校的大部分學生都已超出平均水平了。還有，我只聽說中國高校擴招帶來各種問題，沒想到美國人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六年，美國大學學生人數增長百分之十七，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學年百分之七十的高中畢業生就讀於某所大學。X教授在書中卻指出：不是所有人都適合上大學。他認為，美國人盲目崇拜大學教育，高教「門戶開放」帶來的結果是有利的學生基礎太差，無法成功完成學業。那些負債累累而終於畢業者，也未必能找到一個收入足以抵銷債務、補償巨額教育投資的工作。

「X教授」當然是筆名。二〇〇八年他曾在美國著名期刊《大西洋月報》（The 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同名長篇散文，引發極大爭議。書中摘錄了作者收到的各色批評：歧視工人階級，教學水平低，懶惰，勢利，甚至是一「白領罪犯」的罵名。從書中描繪來看，他的確是個思維較為老派的老師，引導學生分析美國文學時，他不願意識及有關種族歧視的黑暗歷史。從權威的歷程，並不贊同師生平等的論調。但他有些觀點卻有振聾發聵的文化批判效果。如他說二十一世紀美國人儘管鼓吹「多元化」，卻不願承認個人天資和學習能力有差異。學生如果無法順利畢業，大眾不會歸咎於他們本人能力不夠，而是指責教授的教學方法。其實，只有學生本人擁有極大動力、精力和能力才可能在大學成功。X教授因為在二〇〇七年經濟蕭條前剛買了新屋不得不兼職：白天為政府部門工作，晚上下了班再去兩所大學教夜校，一門課每學期約收入二千美元。書中描述他的打工生涯時不免被個人經濟負擔重、家庭關係緊張的餘韻涉及。但作為一個資深作者，他對寫作的愉悅和艱辛也別有會心。

蕭紅具有東北人的率真、豪爽，來香港時間不長，即融入了當地的文藝圈子。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假座大東酒店舉行的會員聚餐會上，她洋洋灑灑發言一個小時，報告重慶文藝界人士的艱苦生活、險惡環境，但是他們沒有放棄手中之筆，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寫出更好的作品來。

一九四〇年四月，在《星島日報》「星座」主筆戴望舒的關照下，蕭紅、端木蕻良以「文協總會」會員身份，登記成為「香港文協分會」會員。五月十一日，遷港的嶺南大學師生舉辦文藝座談會，蕭紅應邀與會發言，「蕭紅先生演說頗長」（《嶺南週報》）。五月十二日，出席「黃自紀念音樂欣賞會」。

八月三日下午，「香港文協分會」紀念魯迅六十周年冥誕大會，在加路連山孔聖堂舉行，三百多人與會。許地山致開會詞後，蕭紅作魯迅生平事跡報告，長虹歌詠團獻唱。晚上，舉行內容豐富多彩的文藝演出，節目有田漢的話劇《阿Q正傳》、蕭紅執筆的一幕四場默劇《民族魂魯迅》（劇本後於十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的《大公報》文藝副刊連載）。

文藝晚會上，蕭紅十分活躍。她身穿黑絲絨旗袍，渾身散發出東方女性的韻味。蕭紅朗誦魯迅的雜文，留給朋友們的印象是歷久彌新的：「瘦卻卻的，聲音不高，但朗誦得疾徐頓挫有致。」（徐遲語）

長眠香港是她生命的最終歸宿蕭紅火化後，端木蕻良將骨灰裝入兩個花瓶，一隻埋在瀕臨大海、風光旖旎的淺水灣邊，一隻埋在聖士提反女校校園後山坡上的一棵小樹下。一九五七年，淺水灣邊的蕭紅墓，遷葬廣州郊區燕嶺路銀河公墓。聖士提反女校後山坡上的蕭紅骨灰瓶，端木多次託人尋找，都沒有結果。

「時間久遠，山上樹木茂密，根本無法辨認。」「山前前幾年已被校方翻新修整過，沒有什麼發現。」——香港大學盧瑋璽教授給端木複信說。

一九九五年三月，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夫人、英國人蘇珊娜·浩女士郵寄給端木聖士提反女校上世紀四十年代地形複製件，請他指認當年埋葬骨灰瓶的確切地點，但是複製件模糊不清，當事人竟無法辨認。

一九九六年十月，端木蕻良辭世前立下遺言：將其部分骨灰灑在聖士提反女校後山坡蕭紅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一九九七年，端木夫人鍾羅群女士飛赴香港，幫助丈夫實現生前遺願。在香港創作了一生三部長篇中兩部的蕭紅，以她往日夢寐以求的「寫作佳境」——香港——作了她的長眠之地。

陶潛詩云：「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足道，托體同山阿。」（《挽歌》之三）後兩句意為：人死了還有什麼好說的呢？他的肉體與靈魂已經同山脈融為一體。可以這麼說：蕭紅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屬於香港的。